

西 蒙 諾 夫 等 著



論作家的勞動本領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論作家的勞動本領

西蒙諾夫等著

周若予等譯 曹葆華校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КОНСТАТИН СИМОНОВ И ДР.
О КУЛЬТУРЕ ПИСАТЕЛЬСКОГО
ТРУДА И ДР.

根據 1954, № 118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翻譯出

論作家的勞動本領

原著者 蘇聯 西蒙諾夫 等
翻譯者 周若予 等
校稿者 曹葆華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局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大東印廠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書號(777) [I I 137] 類別 文藝一般
字數 97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3/8
1955年3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1—20100 冊

定價 四角九分

目 次

論作家的勞動本領.....	西蒙諾夫(一)
美學理想與正面人物問題.....	留里可夫(二三)
美學問題與蘇聯文學.....	索包列夫(四)
反對藝術理論中的主觀主義.....	葉戈洛夫(五三)
關於「新世界」雜誌的錯誤(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的決議).....	(八八)
關於「新世界」雜誌的批評欄.....	(九五)
愛倫堡的新的中篇小說.....	西蒙諾夫(一〇七)
關於康·西蒙諾夫的一篇文章.....	愛倫堡(五)
給編輯部的信.....	西蒙諾夫(一五七)

編輯部的話

『文學報』編輯部(二九)

總後記

(二四)

論作家的勞動本領

西蒙諾夫

我們常常說，我們文學的讀者是爲數很多的和要求很高的。有時候，我們在這些字眼上，還加上「嚴格的」這一形容詞。雖然，對於這一公式，我們已經十分習以爲常，但是，也許還值得好好想一想它的含義。是的，我們的讀者是要求很高的。是的，我們的讀者是嚴格的。但是，他們爲什麼是嚴格的呢？爲什麼是要求很高的呢？他們的嚴格和要求高，是否就正好僅僅表現於他們對待文學的態度呢？

不是的。我們的蘇聯讀者是要求嚴格的人，不過，他們首先是對自己要求嚴格。我們的國家是最高度實事求是的人們的國家。從蘇維埃政權建立三十七年以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人已經習慣於使自己的言行一致，使實踐跟上意願；他們已經習慣於把開了頭的事情進行到底，而要做到這點，就需要很多地很頑強地工作。

蘇聯讀者習慣於每天緊張地勞動。同時，他們還找出時間和力量來學習、參加社會生活、讀書、看戲、看電影、聽講演、參觀博物館。我們的讀者過着充實的、有意義的、自覺的勞

動生活，而且認爲正是這樣的生活方式才是自然的準則。他們要求嚴格的原由也就在這裏。正因爲他們首先嚴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們也嚴格要求其他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們文學家。

根據我們讀者的意見，——而這種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作家應當過辛勤勞動的生活，應該找出時間來學習、讀書、自修；簡單講來，應當成爲一個像他們、像我們的讀者自己那樣的勞動者。我想，在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前夕，談談這方面的問題也是不無好處的。

當然，在讀者言論和讀者來信中所談的，並不是我們日常工作的方式，而是我們日常工作結果。讀者評論技巧的好壞，把書本內容和生活事實加以對比，在某些場合下指出我們對所描寫的對象的知識很差，要求我們描寫文學中還沒有描寫過或描寫得很少的事物。一句話，所談的主要是關於我們的作品，而不是關於我們如何寫這些作品。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讀者並不知道他們所讀過的書的作者是否每天都伏在寫字桌上，也不知道他一天工作幾小時。

但是，要知道，作品的好壞是直接取決於我們如何寫這些作品，如何準備創造這些作品，在手稿上面花費了多少勞動，我們的寫作勞動的本領怎樣，也取決於我們創作某一部作品時我們的一般文化水平如何。

不久前，我讀到準備付印的三卷高爾基的書信。在這些前後幾達五十年所寫的書信中，高爾基多少次堅決地強調道：天才就是勞動；人的天賦就像火花，它既可能熄滅，也可能燃燒起來，而逼使它燃燒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勞動、再勞動。

然而，必須坦白而且老實地說，我們中間有很多人，他們的寫作勞動的本領是相當不行的，而這個缺陷是非常嚴重和緊要的。我們相當大的一部分作家不妨重新考慮一下他自己對文學家的生活和工作作風的看法。

自然，高爾基是一個巨人，是文學中恐怕不復再現的一個現象。但是，他對寫作勞動的看法、他的善於勞動的本領，是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學習的。

高爾基在自己的書信中提到他每日工作不少於十小時，——這裏包括他自己的寫稿工作，也包括他所作的廣泛的通信工作，他的通信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深刻的、而且極其細緻的文學批評工作。在這些書信中，我們可以讀到，他提起他整天寫作，以致肩膀和手腕都發痛了。從這些書信中，出現了一個人的形象，他每天起來就爲了在一天之內開墾一大塊土地，他不離開桌子，也不去休息，直到他一點也不遺漏地開墾完畢爲止。最後，到他給自己休息的時候，他的肩膀和手腕在緊張和艱苦的寫作勞動之後隱隱作痛了……

那末，我們這些作家們是否也這樣竭盡全力地工作着呢？人民給予我們的是如此之多，

他們是有權利嚴格地要求我們的。

坦白地說，當我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時，我想了一想，雖然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懶漢，但是日常的持續的寫作勞動本領，我却還未充分地具有。我能够記起，我有時不僅一連幾天，而且甚至一連幾個星期和幾個月沒有坐在寫字桌前。固然每次都可以找到爲自己辯護的理由，而找不到理由是不會的；一回這個，一回又那個來妨礙我，——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我沒有寫，這就是說，我沒有做自己主要的事情。我強調持續的文學勞動，因爲我們中間有許多人被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工作佔去了不少時間，所以在這裏文學勞動的持續性是特別必需的。不要把計劃放在將來，——譬如說，等我有了創作休假，擺脫了所有的事務，我就一下子把什麼都寫好，——而正是要每天持續地工作，哪怕是一個半到兩個鐘點，但是，是一天天地不斷的。例如，著名作家維里斯·拉齊斯許多年來不間斷地工作着：他每年出一冊新書，同時他還是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因此，他所肩負的「重擔」，要比作家的其它任何一種社會工作更大。

我完全沒有這種意思，說將來總有一天，作家突然不再需要做社會工作了。在我國的社會生活裏，作家已佔有這樣的一種地位，譬如說，不能設想沒有作家參加的保衛和平委員會，很難設想沒有作家參加的文化代表團；不能設想作家不參加任何廣大的社會政治運動。我

們應該以此自豪，而不應當爲此發牢騷；假如我們對本國人民的社會生活袖手旁觀，這對於我們文學家將是一種恥辱。

此外，我們還有自己的作家組織，它是一個龐大的、複雜的、多民族的組織。作家協會有許多出版機關、幾種機關報、幾十種雜誌和文輯。這一巨大的業務是需要作家自己來管理的。而且總有相當一部分文學家——今天是這些，明天是那些——永遠不能卸去作家協會委託給他們的任務——領導這一巨大文學業務的某些部門。

恰好相反，我覺得，在文學組織中或機關報刊中擔負社會工作的人們的圈子，應當比現在更廣大些。我們常常習慣於把所有的工作總是堆在那幾個文學界知名人士身上，而不去尋找一些新人，這些新人是可以很熱情很好地擔負起對他們講起來是新的社會工作的。

總之，作家的社會工作過去有，現在還有，將來也必定有。但是這不應當影響文學的勞動作風，不應當影響它的持續性，因爲不每天伏在寫字桌上工作，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對這一工作生疏起來。有的作家，在對每天寫稿的工作感到生疏後，就開始把社會工作當作擋箭牌，他躲在後面，在道義上爲自己的多年沉默作辯護。也還有這樣的情況，就是當這樣的作家終於有時間坐下來時，他已不能着手工作了，因爲他忘記了，生疏了，就像一個鋼琴家，多年沒有彈琴，失去了手指的必要的靈活。

我故意先從那些被社會工作佔去不少時間而在自己的寫作勞動中造成一定困難的人們談起。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持續的工作，只有高度的寫作勞動的本領，才是克服實際困難的唯一方法。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的作家，他們並未担负這樣繁重的社會工作，竟致被佔去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工怍日。我們這些為數很多的同志，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自己自由支配下的。可是這些時間却常常利用得很不好。

我們很少記起工作的「神聖時間」，——這是作家自己和他周圍的人所應該習以爲常的，每天在這些時間作家一定要寫作，不因爲其它任何事情而離開他的手稿。

甚至在作家組織中也會引起驚訝，如果打電話給作家，而他家裏人回答說，某某作家不能馬上來接電話，他在結束工作前不能和任何人談話，而他結束工作的時間是在某時某刻。……有的人甚至會把這種回答當作一種傲慢和粗魯，雖然，誰也不會把一個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或工程師，在他未下班前，拒絕跑去接與他工作無關的電話，認爲是一種傲慢或粗魯。況且根本就很少人會想到在工作時間給一個分明在工作的人打電話，而且把他叫到電話跟前來。

我們常常自己破壞自己的工作的「神聖時間」。如果文學家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時間，

那末，當然別的人也不會尊重他的工作時間的。

這個問題看來似乎是狹隘的職業性的問題，不值得提出來進行廣泛的討論。但是，在代表大會之前，即使討論一下這種職業性的問題，也不是什麼罪過。況且，有些職業性的問題是直接關聯到爭取我們文學家對生活的深刻認識和我們整個文學的藝術技巧的提高的。

認識生活，這並不是旅行，而是工作。

我不贊同這種看法：作家並不需要作任何創作的出差，因為在一個月、兩個月或甚至三個月內，總歸是不會認識生活的。在短時期內要認識生活，當然是不行的，但是，作家終究不是睜圓大眼瞅着他一路所碰見的東西的新生兒。如果作家已站穩腳跟，已經歷了一定的勞動道路，已看到過人和生活，那末，他出去作兩三個月的創作出差，——譬如說，到新荒地去，——不是去求取知識，而是去充實知識。當然，他會遇到新環境中的新人。但是，在這以前，他已看見和認識其它各種環境中的其他不少的人，因而在以後他要創作新的文學作品時，他的寫作的基礎就不僅僅是他在這次創作出差中所見到的東西，而是他的被最近這次旅行所豐富了的全部生活經驗。作家外出旅行時，如果像一隻土耳其的大鼓那樣肚子空空，那末，並不是兩個月的或三個月的創作出差能給他什麼幫助的。

旅行——新的人、新的印象——對文學家是一種巨大的和必要的助力。同時，旅行也是

勞動的開始，而且它本身就已經是對將來作品的一種勞動。

作家從旅行回來，應當像很好地完成了一件工作後回來一樣，他在路途上所過的日子，應當充滿着勞動。一兩個月的時間，如果到處走馬看花，那就幾乎算不了什麼；但是，如果像高爾基那樣地不遺餘力地工作，了解人們，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和勞動狀況，如果詳細地盡量地記下談話和事實，記得比以後所需要的十倍還多，以便從中有所選擇，——記得「肩膀和手腕都發痛」，……那末，一兩個月的時間也就很起作用了。

這樣的旅行，與某些作家在創作出差的幌子下所作的消遣的或半消遣的遊玩，有着天壤之別。出差費是給作家用於工作旅行的，——它是預先支付而後報銷的。作家應當以自己的作品來報銷；對於每個作家都應該堅決地、毫不放鬆地要求作這樣的報銷。

寫任何一本反映人民生活某些方面的嚴肅作品，是不能只靠作家的個人印象和他的個人經驗的。不管他個人的經驗如何豐富，但要把整幅圖畫完全看到，這還是不够的。除了個人的印象外，必須有廣泛的知識，必須在書籍、材料和文件上面下工夫。這是文學勞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作家輕視這部分勞動，那就必然會影響他的作品。正因為這樣，所以作家才會忽視某些個別事實的一般意義，把個別認作是一般，鑽在經驗主義裏出不來，喪失了遠景。

此外，個人的記憶和印象是不可靠不精確的東西。雖然毫不足怪，作家的個人經驗始終是主要的發條，沒有它，作品的機器根本就開動不起來，但是，應當以別人的經驗、別人的印象、別人的記憶來反覆地檢驗個人的經驗——甚至對於你自己親眼看到的事件，也應當如此。

這是一種精細的勞動。然而作家的藝術虛構所應該依靠的正是這種精細和勤懇的勞動。一般說來，文學只是勤懇的人們的事業，而對於那些不願勤懇勞動的人說來，文學是一件不適當的工作。

在精細的準備性的勞動以後，就開始寫稿的勞動，——在一勞動中，有多少個作家，就有多少特點。因此，在這裏定出任何共同規則，都是可笑的。不過，畢竟還有一個共同的、而且在我看來是絕對的規則，那就是結束一篇寫稿的工作時，就立即着手下一個寫稿工作，着手製定計劃，着手準備和收集材料。可惜的是，這個關於持續的文學勞動的絕對規則，已被我們的許多文學家忘記乾淨了。許多人在寫完一部作品後到着手寫另一部作品之間的一個停息時間，帶有幾乎是惡兆的性質。一個人出版了一本好小說，於是整年到處去出席讀者座談會，沉醉於新得到的榮譽；讀者座談會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有的作者看起來太醉心於它了，以致連寫作都沒有工夫了。而後，作家參加把他的小說改編為劇本的工作，而後又參

加改編爲電影劇本，而後又參加改編爲小歌劇，而後——過了三四年——他聲明他已着手寫新小說了。可是，已不該是他着手寫新小說，而該是他寫完新小說的時候了。又過了三年，我們重新又聽到同樣的一些聲明，可是看不到完成了的小說，於是不由得懷疑起來：這種作家真是在工作呢，還是僅僅說他在工作……

當然，假如結果能創作出一部非常好的作品，那末，即使七年也不能算作很長的工作期限。雖然，托爾斯泰即使寫戰爭與和平也沒有用到七年的時間，可是，我敢說，這不僅是由於他具有非凡的天才，而且也是由於他這些年頭每天都在工作。

把七年花費在一部好的小說上，這是並不可惜的。可是我很想談一談我的焦慮的心情，這是我有時在同那些常常說自己在工作但很少拿出工作成果來的人們談話中所感到的。這些作家的生活方式，他們之時常到療養地去休假，他們之能够在白天任何時候到處出現，——以致你弄不清楚，到底什麼時候才是他們的「神聖的寫作時間」，——所有這一切引起了種焦慮：也許這些作家在工作吧，但是他們這樣地工作，慢騰騰地，一點兒也不着急，反正是「用不完的時間」……

當一個作家在創作了一部好作品之後，非但不去創作第二部好作品，反而從勞動者變成一個半二流子，這已經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他和社會有關的行爲了。

要知道，這樣的事實還並不是太少見的。正是由於缺乏寫作勞動的本領，所以才發生這種情況：我們許多作家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比他的第一部作品較為遜色。我們的作家常常在成為真正職業作家之前，就自尊為職業作家了。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使青年作家認為他不再需要學習了，不再需要掌握寫作勞動的本領了，本來，寫作勞動將成為他畢生的勞動，他應當在勞動中成為精通自己業務的能手。就從這時候起，便漸漸養成很少勞動或勞動後長久休息的習慣，養成一揮而就的潦草馬虎的工作習慣，漸漸不習慣於持續的鍛鍊，不習慣於整天、整個星期、甚至整個月的失敗，而這種失敗是在作家寫作作品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的，並且也只有以伏在寫字桌上的持續不斷的工作來克服。只有在這樣工作之下，才能習慣於把數十頁不成功的稿子一筆勾去，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每天在工作着的人都知道，在他一年的三百個工作日中間，總有五十天或一百天是不能產生什麼預期的創作成果的。但是一個文學家如果養成了單憑靈感的衝動而突然工作一陣的習慣，那他要勾去幾十頁寫成的手稿，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因此他常常要就拋棄自己的構思而另想出一個來，要就開始把壞的認作是好的，把失敗的認作是成功的，漸漸失去了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因為他很少勞動，而那些哪怕是花費了他一點點勞動的東西，也就因此被他認為是很寶貴的了。

我們的作家無須作一個手忙腳亂的人，也無須每半年必得寫出一本書來。誰也不會來催促他、逼迫他。但是，只談論人民的努力，只談論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城鄉勞動者的偉大事蹟，——只是在嘴上談論，而自己却不像我們所講的和所寫的那些勞動者一樣，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時，像這樣的人能生活在我們的國家裏嗎？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對於每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都有一些起碼的要求，可是我們有些作家對於自己竟連這樣的要求也不提出來；他們在熱愛文學和期待有新的文學巨著出現的蘇聯讀者面前，是應當感到羞愧的。

若 予譯、葆 華校（譯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蘇聯「文學報」）